

圆明园蒙古包形制考

额尔德木图、张鹏举、白丽燕、扎拉根巴雅尔

内容摘要：清代圆明园蒙古包是自成一个体系的官式帐幕类型，其在蒙古包建筑史上的地位显著，成为继元朝宫廷帐幕之后的一种最高典范。本文仅就其中的梅花式蒙古包、方形蒙古包、大蒙古包等三种子类型予以研究，基于对蒙古包形制的本土认知与经验，对文献记载与宫廷画卷予以深度阐释，从而获得了圆明园蒙古包形制的若干关键信息。此项研究将为圆明园蒙古包体系的建构工作起到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圆明园蒙古包、梅花式蒙古包、方形蒙古包、大蒙古包

蒙古包是清代宫廷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帝在蒙古包中筵宴蒙古王公的行为本身作为草原黄金世系礼制的延续是一项值得探究的文化现象。清宫蒙古包虽源自蒙古高原的古老建筑形式——穹庐毡帐，但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包含多种风格类型的建筑体系，在结构、尺度与材料三方面均具备了明确的形制规定，成为一种官式高雅蒙古包类型。故其形制与蒙古本土的传统形制具有一定区别。清宫蒙古包的搭建地点主要在以圆明园为主的京城宫苑与热河行宫两处地方，且两地蒙古包的形制要求完全相同。故可以将清宫蒙古包统称为圆明园蒙古包。本文仅就自乾隆初年至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内的几种蒙古包形制进行了研究。圆明园内的蒙古包主要搭建于三处地方，即山高水长、含经堂以及依据需要而临时选择的区位，如月地云居等。圆明园蒙古包是举行外藩宴的礼仪场所，其类型多样，形制各异。清廷在继承明代汉式宫殿建筑形制的同时，传承并发展了草原传统建筑形式，将二者合为一体，建构了清朝宫殿建筑体系。

一、引用文献概述

本文主要引用了“清实录”、嘉庆朝“理藩院则例”、道光朝“理藩院则例”、“金鬘”、“张嘉呼图克图传”、“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传”、“智者之悦白史”等蒙古文文献以及“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清代宫苑则例汇编”等汉文文献。多部描绘宫廷宴赏情景的清代画卷亦为本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信息。

清代历朝官修史料均由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而蒙古文史料并非是对满汉文原稿的简单翻译，而是“有其自己的编写制作过程”¹。仅就蒙古事务的历史表述而言，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如汉文清实录所记“大幄次”在蒙古文清实录中均以“伊和蒙古勒格日”，即大蒙古包指代。再如，相比汉文史料中对蒙古包的多种称谓，蒙古文史料仅以“蒙古勒格日”与“查查日”，即蒙古包与帐幕两种称谓指称，故对确定“幄次”、“武帐”等多种汉文名称的属性起到重要参考作用。

然而，蒙古高原作为地方和边疆区域，蒙古文文献对历史事件的记述也有其片面性。如涉及圆明园山高水长、热河行宫、京师各寺院的蒙古包信息较多，而关于舍经堂蒙古包的记录却非常少。当然，晚清内外札萨克蒙古丰富的社会史资料与延续至民国末年的王府帐幕信息对史料之缺漏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弥补作用。

二、圆明园蒙古包之形制

圆明园蒙古包之形制有多部文献、图像史料可资佐证。文献中有多处有关蒙古包类型之名称、尺度、规格、材料与结构方面的记载。宫廷画卷给出了外部形态、覆盖物构造、装饰细节以及绳索系法的准确信息。

（一）蒙古包之尺度

“热河园庭现行则例”卷十载“御幄蒙古包七丈二尺，一分；又五丈九尺五合蒙古包一分；又四丈二尺西洋房二座；又五丈二尺花顶蒙古包二架；又二丈五尺备差蒙古包二十四架”²。文献中多处指明在圆明园和热河行宫搭建的大蒙古包直径为七丈二尺。七丈二尺并非是圆明园蒙古包中的最大直径尺度，但却成为大蒙古包的标准尺度。马嘎尔尼准确估算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皇帝赐宴英使的万树园大幄直径，“全幄做圆形，圆径之长约在二十四码至二十六码之间”³，即 21.9 米至 23.8 米。很巧的是，一直存续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蒙古地区最大的蒙古包直径也是 23.5 米。

若依据清代营造尺标准，将上述蒙古包尺度转换为现代长度单位，其结果是“七丈二尺为 23.04 米；五丈九尺为 18.88 米；四丈二尺为 13.44 米；五丈二尺为 16.64 米；二丈五尺为 8 米”。上述大蒙古包、五合蒙古包等类型常见于文献，可见其是当时的主要蒙古包类型。清宫蒙古包尺度普遍大，最小的备差蒙古包等于近代蒙古高原的八哈那蒙古包，而此类蒙古包多由贵族阶层使用。近代蒙古平

民所用蒙古包的直径在 4 至 5 米。

那么，大蒙古包的室内容积到底有多大？“啸亭续录”、“清稗类钞”等文献载“大黄幄，可容千余人”⁴。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皇帝八旬大庆诗句中有“武帐穹窿容百人”的信息。⁵当然，蒙古包容量视仪式规制、室内空间布局等情况而各有不同。笔者认为，后一种记载应当符合历史事实。因为，近代蒙古地区王府、寺院大蒙古包的平均容量为 300 至 500 人，若再扩大便失去蒙古包形制特点，成为临时搭建的帐幕。

（二）蒙古包之形态

基于对蒙古包形制的本土认知与经验，本文选择了乾隆年间绘制的 13 张图来做出下列形制推测与总结。这些画卷包括：郎世宁绘于乾隆二十年（1755）的“乾隆帝万树园赐宴图”（图 1）；佚名“万树园赐宴图”；张廷彦、周鲲绘“苑西凯宴图卷”（图 2）；方琮、郎世宁绘“丛薄行诗意”；佚名“乾隆射鹿图”；郎世宁等绘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中的拔达山汉纳款、鄂垒扎拉图之战、凯宴成功诸将士（图 3）、通古斯鲁克之战、乌什西长献城降、效劳回部成功诸将士、御题格登鄂拉斫营之战等七张图；威廉·亚历山大（1767-1816）所绘“觐见中国皇帝图”。⁶



图 1 乾隆帝万树园赐宴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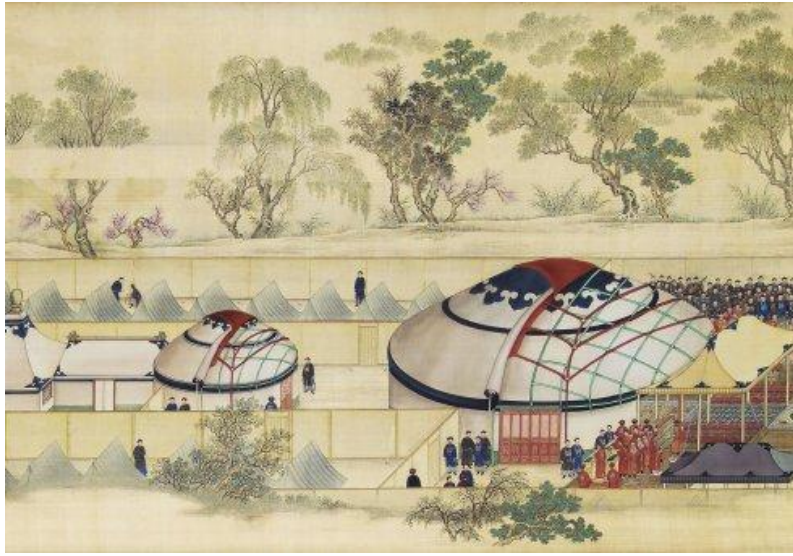


图2 苑西凯宴图卷



图3 凯宴成功诸将士

上述画卷基本含括了蒙古包的正、侧、背各立面的画面，由此除内部木架构之外给出了其它多种关键信息。本文仅就本文所需几处关键点，结合蒙古文文献信息给予推测与总结。

1、蒙古包与帐幕之多样性组合

大蒙古包由作为主体的蒙古包与作为门廊及过渡空间的黄幕组成。“理藩院则例”规定“武备院支搭大蒙古包暨张黄幕”⁷。蒙古文则例相应条目记为“伊和蒙古勒格日夏日查查日”⁸，即大蒙古包黄幕。查查日的满蒙读法与拼写相近⁹。带有门廊的大型蒙古包作为礼仪场所在内蒙古一直沿用至 20 世纪 40 年代。除此

之外，蒙古包与四方房、西洋房、帐幕或合或分，或呈主房或穿堂房，满足了仪式与休憩的多样性需求。

2、顶毡遮盖方式的统一性

大蒙古包和部分蒙古包的顶盖与天窗毡为一体，将顶盖全部遮盖时包顶绳索将全部被遮盖，而半启时露出前半部分的绳索。在顶盖下方似有红毡制天窗毡，至近代为止，红毡一直用于遮盖大藏经箱等崇高的器物，故用于御用大蒙古包也是理所当然的。

3、华盖或伞状柱式饰顶毡的使用

支于大蒙古包两侧的蒙古包均使用了伞状柱式饰顶毡，即最为原始的“胡鲁图日格”。光绪三十四年（1908）参加紫光阁筵宴的阿拉善王密各瓦祺尔称“蒙古包顶上遮有黄色华盖的帐幕”¹⁰。而至 20 世纪中叶，蒙古地区已无整体遮盖式饰顶毡，代之以简易的装饰性饰顶毡。

4、绳索系法的统一性

大小蒙古包一致使用一种绳索系法，并且使用被称为“胡鲁图日根奥斯尔”，即包顶网套的独特方法，而这一方法主要用于清代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地区的蒙古包，并沿用至今。此地域与木兰围场及京师距离相近，其对清宫蒙古包绳索系法的影响可能性较大。

5、隔扇门及壁窗的使用

大蒙古包设有侧门，并采用了汉式隔扇门。圆明园蒙古包通常设有前后二门，故增加了采光性能。20 世纪 40 年代时阿巴嘎旗哈日占诵经会曾有一座大蒙古包。此包由四根盘龙红柱支撑天窗，左侧与北侧各设一门，门为双扇木门，共有 18 片哈那，折叠时哈那高达 3 米。¹¹可以推测此蒙古包的直径在 12 米以上。对于以柱网承重的大尺度蒙古包而言，在墙体上设置多个隔扇门及壁窗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也是清代图卷中从无开启天窗现象的原因。

（三）蒙古包之结构

圆明园蒙古包的结构，即木架构形制继承了蒙古本土形制。蒙古包木构件——天窗、顶杆、网壁之名称，在清代蒙古文文献及现代蒙古语中分别为陶脑、乌尼、哈那，而在清代汉文文献中分别为天窗、椽子、哈那。“哈那”名称之直译可以说明对传统形制之某种程度的传承。

据蒙古包结构定律推测，上述清宫蒙古包应多数使用木柱，直径小于 10 米的使用双柱或四根木柱支撑天窗，而大于 10 米将使用双环天窗，并使用柱网支撑。据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五十六年（1717）编纂的蒙古文“二十一卷本辞典”，可以推测此时的蒙古包均为捆接式蒙古包，而非今日普遍使用的插孔式。该辞典乌尼条目载“散系于蒙古包天窗的木杆为乌尼”¹²，而陶脑，即天窗条目载“系蒙古包乌尼的圆顶为陶脑”¹³。大蒙古包很可能是插孔式天窗，但无法排除使用捆接式技术的可能性。

（四）蒙古包之材料

清廷在沿用蒙古包本土形制的同时广泛采用中国南方木材，从而使原有材质结构产生了一定变化。材料的革新体现在木构件、皮索及覆盖物的变化上。如含经堂梅花式蒙古包木架构使用斑竹、云竹等木材¹⁴。而在蒙古高原自匈奴时代便使用沙柳、榆木等木材。在串接哈那木以及连接天窗与乌尼尖的皮索材质方面，清宫主要使用鹿筋，而蒙古人仅使用骆驼皮和牛皮。另外，圆明园蒙古包开始使用玻璃等新材质，使蒙古包的形制与功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覆盖物方面，除珍贵的毡毯之外，冬季遮盖毛毡，夏季遮盖绸缎的做法是蒙古王公府邸蒙古包的一贯做法。圆明园蒙古包的木架构一般要上漆，故常有将库存蒙古包木架构刷漆见新的记录。

（五）蒙古包之来源

圆明园蒙古包由工部或内务府造办处承制，但不可否定蒙古各部进献宫廷的可能性。制作与搭建蒙古包的任务由造办处与武备院负责。其设计与应用过程具有一种明确的程式，即各式蒙古包式样被初步确定后需要进呈皇帝，以供审定。并在山高水长等处搭盖呈览，待允准后推广至各宫苑。在制作蒙古包的工匠名单中时有蒙古名称的现象证明了蒙古工匠的参与。若能确定蒙古包由哪一蒙古部族的工匠参与制作，或知道进献蒙古包的盟旗，就可以确定蒙古包形制的诸多细节信息。因为，蒙古包具有显著的地域与部族属性。

清朝规定当皇帝巡幸盛京和木兰行围时周边蒙古盟旗或随围王公需预备蒙古包。“恭遇皇上巡幸盛京，卓素图阖盟王公贝勒贝子公、额駙、札萨克台吉塔布囊等，公同进宴一次。该盟长等谨备蒙古包六架…先期报院”¹⁵。皇帝驾临木兰后“昭乌达、卓素图二盟暨喀喇沁札萨克王、贝子合进筵宴，谨备蒙古包五架”

¹⁶。月牙城进宴时“昭乌达、卓素图二盟暨喀喇沁札萨克郡王、札萨克公等预备蒙古包五架交武备院”¹⁷。木兰秋狝之时，随围蒙古王公按例在皇帝行宫外搭建大蒙古包进宴。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八月辛巳日喀喇沁郡王等人在皇帝行宫东门外“搭建大蒙古包进宴”，而在丁亥日科尔沁亲王、巴林郡王等人在皇帝的另一座行宫之西门外“搭建大蒙古包进宴”。¹⁸蒙古王公支大蒙古包进宴之记录也出现在嘉庆朝实录里。嘉庆七年（1802）蒙古王公在皇帝行宫西门外、¹⁹嘉庆十一年（1806）在行宫南门外²⁰、嘉庆十六年（1811）在行宫东门外²¹、嘉庆十八年（1813）在行宫西门外分别搭建大蒙古包进宴。²²据理藩院规定当各盟旗准备就绪后“由院奏请钦定日期及在何地方预备”²³。然而，进宴用大蒙古包由武备院提供或是由蒙古王公自行携带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含经堂蒙古包

含经堂宫门月台南十字形交叉的甬道两侧是搭建蒙古包的区位。经考古发掘发现圆形毡帐与方形毡帐基础各两处，前者直径均为12.5米，后者边长均为13.9米²⁴。其正南另有四座蒙古包基址。据内务府造办处文档，含经堂蒙古包有梅花式蒙古包、四方房等类型。从“含经堂正宫门外并东穿堂门外搭盖梅花式蒙古包地盘纸样”²⁵等文档看，含经堂蒙古包似乎并非只在正宫门外一处搭建。故含经堂蒙古包布局、类型具备了多种可能性。有关含径堂蒙古包之类型，文献记载最多的是梅花式蒙古包，但这一类型也并非只有在含径堂搭建，在山高水长、热河行宫等地均有搭建梅花式蒙古包的记录。

（一）梅花式蒙古包

梅花式蒙古包其实就是一种五合蒙古包。梅花有五朵花瓣，故形象地比喻了连接搭建为一体的五座蒙古包，即五合蒙古包。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一份文档载梅花式蒙古包“中间一架著做径过二丈五尺，前面一架著做径过二丈，其余三面三架径过俱著做一丈八尺，其中间蒙古包两边扇户不必挖去哈那，即将外墙里围挖缺按挂纱窗，此五架蒙古包俱安天窗”²⁶。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一份文档载“太监鄂鲁里传旨：圆明园含经堂搭盖五合蒙古包，中间前厅新做白底押印红花毡里围墙拆下，在养心殿东暖阁铺地用，将东暖阁现铺黄底红花毡仍在蒙古包内做里围墙用。于本月十六日，太监鄂鲁里传旨：五合蒙古包内白底红花毡里围墙不必换铺在东暖阁”²⁷。上述记录已充分证明了梅花式蒙古包即为一种五

合蒙古包，并且说明了蒙古包之尺度、布局与连接方式。

梅花式蒙古包由三种尺度的蒙古包连接而成，中间蒙古包，即主蒙古包直径为 8 米，其前面的蒙古包直径为 6.4 米、其余三架蒙古包直径为 5.76 米。含经堂南广场南北甬道两侧各有五座或圆或方的形似毡帐地基的遗址，单从基址之间的距离与穿越中间的甬道看，当是单体蒙古包的基址。因此，需要确定基址的夯筑时间与蒙古包的搭建布局。作为移动性住居，蒙古包其实并非局限于地基，其拆分与组合具有灵活多变的特性。

需要说明的是梅花式蒙古包只是五合蒙古包之一种类型。除乾隆帝之外一些高僧活佛也使用五合蒙古包。“理藩院则例”载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应用蒙古包，由该呼图克图自行备带五合蒙古包支搭”²⁸。嘉庆朝蒙古文理藩院则例在相应条目内只记载了黄布城之规格而未提五合蒙古包²⁹，而道光朝蒙古文理藩院则例中却有了五合蒙古包，并称为“塔本陶和雅勒蒙古勒格日”³⁰。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传记里却未有过此蒙古包。道光十九年（1840），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进京朝觐皇帝，驻于安定门外黄寺，清廷在黄寺南支黄布城，搭三座蒙古包，活佛进驻中间蒙古包。在朝廷为其准备的黄布城东侧另建自带黄布城与前后连贯搭建的三座蒙古包³¹。道光二十年（1841）正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奉旨在圆明园慈佑寺迤西一带搭建黄布城，内设三座蒙古包³²。可以认为，从道光年间开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始用五合蒙古包。而在京师搭建时只支其中三座。连接式蒙古包在清至民国末年主要由蒙古王公活佛使用，其类型有前后连贯式和左右并列式两种，但最多不可超越三架，即三连式或三合蒙古包。由一大一小两架蒙古包前后连贯而建的类型或许就是清代文献所记“葫芦式样蒙古包”。³³那么，清帝作为天下君主享用五合蒙古包也是理所当然的。

含经堂梅花式蒙古包小巧舒适的尺度与布局完美地适应了休憩与安供佛像的功能。据文献可获知，此五架蒙古包中的西一座为佛堂，东一座为办事房，后一座为寝宫，前一座与中一座当是门厅与中厅。³⁴

（二）四方蒙古包

含经堂宫门南北甬道两侧各有两处方形“毡帐基址”，而在清代也有使用方形蒙古包的记录。文档中多处记载四方蒙古包或四方房为外出或行围时所用帐幕，而未发现在含径堂南搭建此类蒙古包的信息。乾隆帝与章嘉胡图克图、哲布

尊丹巴胡图克图等高僧大德之间的交往甚为密切，故也有搭建四方房用于研习佛法之可能性。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奉旨进京的途中，乾隆帝赏赐“上用车轿、四方蒙古包、黄布城、各种仪仗，恩重之极”，并在班禅抵达一日前支于归化城外格尔根拜兴地方。³⁵“金鬘”中称此蒙古包为“盖和木西格苏宁蒙古勒格日”³⁶，即奇特的蒙古包，可见蒙古人对此蒙古包的惊慕之情。

方形蒙古包在清末及民国时期也由部分蒙古王公所使用。阿拉善和硕特旗曾有一种被称为“白榜哈”的大蒙古包，是王公用于继位、举行马奶节时搭建的四方蒙古包。它有前后二门，可以容纳 300 人。木构架由 16 片哈那构成，其中 8 片哈那有 16 个哈那尖，另 8 片哈那有 13 个哈那尖，四角的哈那尖上设有铁环，从而固定四角的乌尼，此类蒙古包共有长短 20 个柱子，其中 4 个长柱用于支撑天窗，而 16 个短柱用于支撑乌尼连接木。³⁷方形蒙古包是史料中少有记述的罕见类型。

四、山高水长大蒙古包

山高水长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山高水长楼为西向的上下各九间楼。其西侧的开敞地为赐宴外藩王公、看放烟火的场地。据样式雷“引见楼前蒙古包及焰火布置平面图”，大蒙古包及其附属蒙古包搭建于这一区位。搭建于山高水长的大蒙古包及帐幕因作为朝廷礼仪场所在文献中记录最多，也有丰富的图像史料。

乾隆三十四年正月（1769）“帝命在山高水长搭大蒙古包四座，四方房一座，并两边配蒙古包两座”³⁸，二月“命在圆明园山高水长搭盖七丈二尺大蒙古包，前面搭盖大些蒙古包四座，后面搭盖四方房一座，两边配蒙古包两座”³⁹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马嘎尔尼记载大幄“用圆柱多根支撑之。柱上有镀金者、有绘各种花纹者、有加漆者，各视其地位及距离之适宜而排列之。”⁴⁰英国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大幄“四周的柱子刷着金漆，帆布垂直悬挂。大幄中间设有宝座，外面的阳光穿过四周的透光处照到宝座上，大幄内的家具含蓄雅致。一个略小的长方形帐篷安在大幄的后面，里面有床，是为皇帝临时休息准备的”⁴¹。

尺度宏大的大蒙古包作为帝国之象征，其实是蒙古帝国至清朝历代文献中所记述最多的蒙古包类型。至清末为止，蒙古地区各王公府邸与寺院均有用于礼仪场合的大蒙古包，其哈那数量一般在 10 至 16 之间。然而，也有更大尺度的蒙古

包, 存续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漠北蒙古大库仑的阿巴岱汗蒙古包便是清代所称的大蒙古包。

波兹德涅耶夫于光绪十八年(1892)到访大库伦, 看到了被称为“巴润斡如格”的阿巴岱塞音汗的蒙古包, 称“阿巴岱蒙古包简直大的惊人, 同它并排的正常蒙古包在它面前就象是一个玩具。据说, 阿巴岱蒙古包内可容纳三百人”⁴²。波兹德涅耶夫本人于光绪三年(1877)曾参观过这项蒙古包的内部, 称在靠北墙的佛像后面有被称为阿巴岱汗的坐床。

阿巴岱蒙古包之木架构及尺度为: 乌尼长 7.9 米, 共分两节。上节长 3.92 米, 共有 156 支; 下节长 3.98 米, 共有 300 支。地面面积为 314 平米。包体体积为 1285 平米。哈那单木长 3.2 米。截面为 4×6 厘米。此包共有哈那 20 片, 每片哈那有 15 个头。门的高宽均为 3 米。设有双重天窗, 里天窗由四根木柱支撑, 柱高 7.5 米。外天窗由 12 根木柱支撑, 柱高 4 米。室内直径为 23.5 米。⁴³仅从直径而言, 阿巴岱蒙古包的直径恰好达到清宫大蒙古包的标准直径——七丈二。可以初步确定, 阿巴岱蒙古包便是清宫所用大蒙古包的原型。

综上, 在圆明园蒙古包体系中曾有大蒙古包、梅花式蒙古包、四方蒙古包、亭式蒙古包、玻璃蒙古包等多种形态。从直径而言, 包含了从一丈八尺至十丈的多个尺度类型。宫廷蒙古包类型曾借由包括模仿与馈赠在内的多重历史作用, 在清宫与蒙古本土之间双向传播, 并留下一些可资参考的遗存或样本。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 我们将最终建构圆明园蒙古包之谱系与类型体系, 复原其形态与结构特性, 再度呈现圆明园蒙古包之历史全貌。

参考文献:

- 1、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大清蒙古实录”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2
- 2、尼日拉图.金峰校注“理藩院则例”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
- 3、宝银海校注“理藩院则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 4、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三合便览.蒙古语文献第四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5
- 5、密各瓦祺尔著.色·斯琴毕力格整理校注“智者之悦白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 6、内蒙古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整理“二十一卷本辞典”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3
- 7、包银海校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传”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 8、勃尔吉斤·道尔格编著“阿拉善和硕特”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2
- 9、(蒙古)博·巴特尔呼.德·敖德苏荣编著“蒙古包辞典”乌兰巴托.2015
钢根其其格等编著“阿巴嘎风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 10、(清)理藩院修.杨选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则例”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
-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2、“清代宫苑则例汇编”.2011
-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
- 14、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 15、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圆明园长春园含经堂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16、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乾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
- 17、(清)纳塔著.乔吉校注“金鬘”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3
- 18、(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 19、(英) 马嘎尔尼著.刘半农译.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
- 20、(英) 斯当东著.钱丽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

额尔德木图: 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教授

张鹏举: 内蒙古工业大学教授

白丽燕: 内蒙古工业大学副教授

扎拉根巴雅尔: 内蒙古工大设计院员工

-
- ¹ 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大清蒙古实录.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2:2
- ² 清代宫苑则例汇编.网络资源. 2011
- ³ (英) 马嘎尔尼著.刘半农译.乾隆英使觐见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104
- ⁴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495
- ⁵ 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乾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641
- ⁶ 由于上述图卷多为学界所熟知,故仅列出三张具有典型意义,且其反映信息能够相互参照的图卷供参考。
- ⁷ (清)理藩院修.杨选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则例.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217
- ⁸ 尼日拉图.金峰校注.理藩院则例.上.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390
- ⁹ 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三合便览.蒙古语文献第四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5:210
- ¹⁰ 密各瓦祺尔著.色·斯琴毕力格整理校注.智者之悦白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51
- ¹¹ 钢根其其格等编著.阿巴嘎风俗 [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78
- ¹² 内蒙古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整理.二十一卷本辞典: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3:91
- ¹³ 内蒙古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整理.二十一卷本辞典: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社.2013:490
- ¹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编.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726
- ¹⁵ (清)理藩院修.杨选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则例.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210
- ¹⁶ (清)理藩院修.杨选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则例.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224
- ¹⁷ (清)理藩院修.杨选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则例.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224
- ¹⁸ 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大清蒙古实录.第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2:80-81
- ¹⁹ 大清蒙古实录.第四卷.2012:672
- ²⁰ 大清蒙古实录.第四卷.2012:715
- ²¹ 大清蒙古实录.第四卷.2012:795
- ²² 大清蒙古实录.第四卷.2012:827
- ²³ (清)理藩院修.杨选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则例.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224
- ²⁴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圆明园长春园含经堂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1
- ²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编.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728
- ²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编.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721
- ²⁷ 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乾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582
- ²⁸ (清)理藩院修.杨选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则例.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390
- ²⁹ 宝银海校注.理藩院则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550
- ³⁰ 尼日拉图.金峰校注.理藩院则例.下.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736
- ³¹ 包银海校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传[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20
- ³² 包银海校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传[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26
- ³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编.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721
- ³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编.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724-725
- ³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176
- ³⁶ (清)纳塔著.乔吉校注.金鬘.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3:292
- ³⁷ 勃尔吉斤·道尔格编著.阿拉善和硕特.下[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2:692
- ³⁸ 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乾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495
- ³⁹ 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乾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497
- ⁴⁰ (英)马嘎尔尼著.刘半农译.乾隆英使觐见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104
- ⁴¹ (英)斯当东著.钱丽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268
- ⁴²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100
- ⁴³ (蒙古)博·巴特尔呼·德·敖德苏荣编著.蒙古包辞典.斯拉夫蒙古文版[M].乌兰巴托.2015:6